

大同鼓楼始建年代考

□ 李海 杜永清 吕仕儒

大同鼓楼系何人所建?始建于何时?《山西通志》中没有记载。现在可以见到的《大同府志》和《大同县志》也仅记鼓楼为明代所建,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。笔者在《四库全书》中发现了明代李贤所撰的《大同鼓楼记》。通过对该文的研究,似可确定大同鼓楼的建造者和始建年代。

一、现存的大同鼓楼

现存的大同鼓楼位于大同城区永泰街(南街)中段,是明楼阁式建筑的典型代表(图一)。

清吴辅宏《大同府志》(乾隆版)记载:“鼓楼,在府治东南,永泰街,明时建。国朝顺治年修,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重修”^[1]。其他《大同府志》或《大同县志》亦有类似记载。清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和咸丰二年(1852年)又先后两次分别对鼓楼加以修葺。

葺。

明朝的大同,楼阁林立,建筑华丽,东有和阳街的太平楼,西有清远街的钟楼,北有武定街的魁星楼,南有永泰街的鼓楼。可惜这些楼阁大部分毁于历代的天灾人祸,只有鼓楼幸存下来。大同鼓楼为一座三层出檐十字歇山顶的过街楼阁式建筑,平面近似方形,面阔进深各三间,底层砖石砌成,东西长17.85米,南北宽14.55米,高约20米。一层十字穿心辟门,西北壁上有阶梯可达二层和三层之上。这一木结构楼阁的第三层檐下斗拱为单翘三踩。当心间三攒,次间两攒,左右山面亦同,一、二层廊檐下斗拱为一斗二升交麻叶拱,各开间斗拱攒数之分布与第三层相同。二、三层均四面辟门,为六采格扇,其外四周置栏杆,游人凭栏远眺,整个大同城一览无余。楼的底层外檐廊下存有清代顺治、康熙、咸丰年代的



大同鼓楼

维修碑记九通,但字迹模糊,难以辨认。

早年,鼓楼二、三层檐下各悬有一方匾:东向上为“歌风”、下为“云开春晓”;南向上为“鼓楼”,下为“声闻四达”;西向上为“振德”,下为“和声鸣盛”;北面上为“时雍”,下为“瞻云就月”。康熙御笔楹联一副镌刻在鼓楼北口东西两根柱子上,上联为“世事让三分,天宽地阔”,下联为“心田留一点,子耘孙耕”,这些匾牌,未能保存下来,甚为可惜。

1966年4月,大同市人民委员会发布公告,公布大同鼓楼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1978年,文物部门对大同鼓楼全面加固修缮,彩绘一新。并在底层东、西、南、北各装门板两扇,一如古式。大同鼓楼现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二、《大同鼓楼记》及其作者

1.《大同鼓楼记》原文

《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》收录了明代李贤所撰写的《大同鼓楼记》^[1]。以鼓楼为记的文献能收入《四库全书》者可能唯此一篇。全国有名的鼓楼,如北京鼓楼、天津鼓楼、南京鼓楼、西安鼓楼等都未入《四库全书》。可见《大同鼓楼记》对深入研究鼓楼文化的重要性。本文不准备深入讨论《大同鼓楼记》,但为了供其他研究者参考,现将《大同鼓楼记》的全文录出(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)。

大同鼓楼记

鼓楼之建,虽有司为政之一端,而其所关则甚要。且人之于昼凡有目者皆知时刻之所在,入夜之际非更鼓以示之,则茫然无从而知,然则更鼓所以代人之目者也。夫一郡一邑,官府列焉,百工具焉,众役在焉,人民聚焉,必有更鼓以示之,则有凭有期而不失其节,庶务由之以兴矣。大同为边方大郡,有亲王以居之,有大将以镇之,有宪臣以莅之,军民之夥十数万人而更鼓不以无设也。或曰:“更鼓说固然矣,而必栖之楼焉,楼之费也甚大,然则斯举也,毋乃劳民伤财矣乎!”曰:“古者郡邑之制必为楼于城门以储钟鼓,名之曰谯,用以警众。其势不高,则其声不扬,而人之听闻也不广。”夫以一楼之建,为十数万人所听闻,则所费者寡,所益者众,亦何劳民伤财之有?或曰:“谯楼之鼓,严昏晓之节而已,今以为知时刻之所在,何也?”昏晓之节有目者皆能知之,惟夜有五时有八刻人所不见,故谯楼之鼓加之更焉。夫天之运行,一昼一夜九十余万里,君子虽向晦息

已安其身,而天则未尝不运行也。苟因更鼓而知运行之时,则凡为臣工者,宁不惕然兴起其自强不息之志,而发其键呼!谓之昏晓之节未矣!

彰武伯杨公信、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王公越,尝建鼓楼于郡中,而郡守李福至京求为记,予故述其所以然之,故貽之。

2.《大同鼓楼记》的作者李贤

《明史李贤传》记载^[2],李贤(1408—1466年),字原德,明代邓州(今河南邓州市)人。一生从政三十余年,为官清廉正直,政绩卓著,是明朝历史上难得的治世良臣之一。明宣德七年(1432年),举乡试第一,次年中进士。到河津等地视察蝗灾后,授吏部验封主事。正统十年(1445年),升任考功郎中,后任文选郎中。正统十四年(1449年),“土木之变”,英宗被掳,李贤脱难回京。景泰二年(1451年),上正本十策,代宗视为座右铭。又论述战车火器好处,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,转户部侍郎,次年又迁吏部右侍郎。李贤博采古代君王治政经验,编为《鉴古录》,给代宗作为施政参考。

天顺元年(1457年),英宗复辟,迁李贤为翰林学士,入内阁,升吏部尚书。天顺五年(1461年),加太子太保。李贤举贤任能,以惜人才开言路为急务,为人耿介忠直,英宗遇事必召李贤,李贤意见多被采纳。天顺八年(1464年),英宗病重,召李贤委以托孤重任。成化元年(1465年),宪宗即位,晋贤为少保、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。李贤经常规劝宪宗,要亲贤远奸,勤政爱民。成化二年(1466年)十二月,李贤病故。特进光禄大夫,左柱国太师,谥号文达。

李贤所著《鉴古录》、《体验录》等均已不存。《天顺日录》、《古穰文集》等书收入《四库全书》,尚留传于世。

三、大同鼓楼始建的年代

《大同鼓楼记》的作者李贤于1466年病故,因此《大同鼓楼记》应写于1466年之前,即大同鼓楼建造年代的下限在1466年。

据《营造法式》“鼓钟双阙,城之定制”,大同建鼓楼的同时,亦应建造了钟楼。乾隆《大同府志》记载:“钟楼,在帅府街,明时建。国朝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重修”。^[3]大同钟楼已于1951年拆除,只留下一口大钟。钟高2.12米,口径1.3米,厚0.10米,重

9999 斤。击之,声闻 30 里。钟上铸有“大明景泰四年四月吉日制”。明景泰四年是 1453 年。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断:明代在大同建鼓楼、钟楼应是较大的工程,必须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:论证、设计、筹款、备料等等。制造钟楼大钟应是前期准备工作之一,因此,造钟是 1453 年,但建楼不一定是 1453 年,要推后几年完全是可能的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根据大钟的记载,大同鼓楼、钟楼建造的上限年代应在 1453 年。笔者曾在《大同日报》发表文章,认为大同鼓楼的始建年代是 1453 年^[4],现在看来,是不够确切的。

《大同鼓楼记》曰:“彰武伯杨公信、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王公越,尝建鼓楼于郡中。”

杨信(?—1477 年)^[5],字文实,六合(今江苏六合县)人,天顺初(1457 年),杨信驻防延绥。天顺三年(1459 年),因军功封彰武伯,任延绥总兵。杨信曾两次任大同总兵。一次是天顺四年(1460 年)十一月至成化二年(1466 年)五月,另一次是成化三年(1467 年)四月至成化十三年(1477 年),卒于任。赠侯,谥武毅。《明史》称杨信“在边三十年,镇以安静,人乐为用”。当时山西行都司就设在大同城内,大同有重兵屯守,最高军事长官即是镇守总兵。《大同府志》记载^[6],明洪熙元年(1425 年)始,大同总兵挂征西将军印,以五军都督及公侯伯之才而贤者充之。

王越(1428—1498 年)^[7],字世昌,明直隶浚县(今河南浚县)人。《明史》称他“长身,多力善射。涉书史,有大略。”景泰二年(1451 年)中进士,历官御史,山东按察使。天顺七年(1463 年),为李贤所荐,擢右副都御史,巡抚大同。王越到任后立刻修缮武器甲冑,训练士兵,修理堡垒,鼓励农业和商业,强化大同防务。成化三年(1467 年),受任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,兼抚宣府(宣化)。成化七年(1471 年),辞大同巡抚,加总督军务,专办“套寇”事。成化十年(1474 年),为延绥、宁夏、甘肃三边总制,总管西北边防军事,后进兵部尚书,加太子太保。成化十六年(1480 年)封威宁伯。后因汪直一案,被劾削爵除名。弘治七年(1494 年)复官,再起为兵部尚书、总制三边。弘治十年(1498 年),王越在朝中的支持者太监李广被诛,忧惧卒于甘州(今甘肃武威)任所。王越著有《王襄敏集》传世。

杨信、王越二人同时在大同任职的时间是 1463—1466 年。在此期间,二人在大同主持建造了鼓楼,即“尝建鼓楼于郡中”。

综合以上分析,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:大同鼓楼建于 1463—1466 年之间。

四、结束语

《大同鼓楼记》结尾写道:“郡守李福至京求为记,予故述其所以然之,故贻之”。李福,真宁(今陕西正宁)人,大同建造鼓楼时任大同知府。大同鼓楼建好后,李福至京求李贤为之作记,这是一个很难办的事。全国各地类似的建筑很多,作为宰相的李贤通常不可能为一个普通的鼓楼作记。但他却单独写了《大同鼓楼记》。其原因是,王越和李贤私交甚好,王越任大同巡抚,还是李贤推荐的。由于建造大同鼓楼是王越主持的工程,所以李贤才会为之作记,并将《大同鼓楼记》收入《古穰文集》。清乾隆年间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,又收录其中。

[1][6] (清)吴辅宏《大同府志》(乾隆版),大同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重印,2007 年。

[2] (明)李贤《大同鼓楼记》,《四库全书》(第 1244 册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 年,536-537 页。

[3] (清)张廷玉《明史》卷一百七十六《列传第六十四李贤传》。

[4] 李海《大同鼓楼记》提供的信息,《大同日报》2010 年 3 月 26 日。

[5] (清)张廷玉《明史》卷一百七十三《列传第六十一杨信传》。

[7] (清)张廷玉《明史》卷一百七十一《列传第五十九王越传》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山西大同大学物电学院)